

# 笔谈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编者按:2008年4月25日,由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3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研讨会,是接续2005年举办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再次以拓展抗日战争研究视角为主旨的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研讨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了抗日战争的研究方法,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的总体影响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影响等。以下是出席会议的部分学者撰写的笔谈。

笔谈人:袁成毅、周东华、丁贤勇、王续添、翁有为、陆发春、张艳、黄正林、王希亮、李淑娟、郭常英、王光银、潘国旗、夏卫东

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如果从一个宽泛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学术命题差不多相当于“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二者表述不同,但其研究的重心都在于研讨抗日战争对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或现代)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大体经历了从完全的革命史叙事方式走向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史、从一般意义的战争史发展到社会变迁史两个重要的阶段。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发展轨迹:早期关注最多的是战争胜利的原因、经验、战争的领导权等问题,这些基本上是革命史叙事的常见话语。8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国内政要与学者屡有否认侵略战争罪责的言行,于是我国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关注到了日本战争的暴行,学界较多地开始关注战争史本身,于是对

“战争与人性”的思考日渐纳入了学术研究的主流,诸如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劳工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成为热点话题。之后,受“现代化理论”以及“社会史”的影响,探讨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或者抗日战争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问题逐渐受到重视,这些新的研究视野无疑极大地扩展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外延。

就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而言,目前仅仅是“承题”与“破题”而已,还谈不上“起讲”,若要“起讲”,自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其中,除了八年抗战本身的历史之外,抗战结束后的“重建”也是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

在我们的习惯中,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直接便纳入了“国内革命战争”的领域,我们较多地关注到了这一时段中国国内政局的演变,其主要线索是国共之间的和与战。的确,八年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从和到战的演变过程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它主导着战后国内形势发展的大局,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命运,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史学工作者聚焦的领域,但作为历史研究而言,如果仅停留在这个领域,显然还缺乏历史学的立体感,事实上,这一时期除了这一线索以外,围绕着战争本身的一系列“善后”问题包括社会与经济秩序的重建,都对近代社会的整体变迁有着巨大的影响。

抗日战争结束后,战时日伪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需要推倒重建,国民党在重建的过程中,名义上实施了“法治”,实则是顽固坚持了“党治”背后的“人治”;在对日伪财产接收过程中,与其说是导致了“国家垄断资本”膨胀还不如说是导致了“权贵垄断资本”的膨胀,从而使人民对当政者完全失去了信心,变革落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差不多成了全民的共识。

总之,探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一定要把视线延伸

到战后这几年的历史。

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近年来,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部分学者开始提倡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主要有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集中于探讨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破坏。这种观点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认为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的现代化,经过“器物—制度—心理”(梁启超语)三个层面的认识的层层演进,在白吉尔所谓“黄金十年”发展后,现代化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却将此过程打断,中国由此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的“谷底”。“现代化”概念的引入,拓宽了原先探讨日本侵华造成中国社会巨大破坏的传统课题,更为客观而全面地看待、检视抗战前中国现代化的成效和日本侵华的破坏力。

第二种思路集中于探讨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作用。巨大的破坏力是战争的特性之一,何况如日本侵华这样的非正义战争,带给中国的只有更为严重的破坏。但是,正如费正清在探讨晚清外国侵华对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刺激时所提出的“防御性现代化”概念一样,部分学者多多少少采用柯文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视角,对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防御性现代化”做出探讨,研究诸如国防现代化、西部边疆的发展等问题。

上述两种思路都将“现代化”作为研究抗战史的范式,虽然针对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单纯强调日本侵华的破坏性和中国抗日的正义性的二元对立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并没有摆脱自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现代化的两种基本思路,即“现代化的中断说”和“防御性现代化说”两种思路。那么,该如何将“现代化”嵌入抗战史研究,使之相较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更为客观,相较于

早先的“美式现代化学说”又有新的发展？

将“现代化”嵌入抗战史研究，不但需要研究日本侵华对中国社会的巨大破坏，探讨中国现代化的“中断”问题；亦要探讨中国如何通过“防御性现代化”，达致战时状态的发展；更要研究中国如何抵制日本侵略，实现国族认同与国家重建。包含上述内容的“现代化”，仅依靠“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不够的，必须用一个更客观、多元、复杂的框架来诊视、重现抗日战争这段多种情感交织、多种因素共处、多条线索共存的历史。

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事实上是有四个相互纠缠的过程构成，即中国国家与社会自清中叶以来不断的“衰败化”与外国侵华造成中国的“半边缘化”纠缠在一起，与之纠缠在一起的是抑制这两种趋势的“革命化”和“现代化”。日本侵华造成的现代中国的“半边缘化”，有三重体现：第一，加剧了清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的“衰败化”过程，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经济解构和社会制度，造成更为严重的落后；第二，吞噬了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积累起来的现代化成果，使中国陷入更为严重的“边缘化”过程；第三，严重破坏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国族建构。抗战期间，中国抵抗日本侵华的“革命”（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学生运动、民族启蒙、外交交涉等）和“现代化”（工业建设、国防发展、国民教育、国族重建等），都可以汇合为一股“现代化”潮流。

由此，笔者所谓将“现代化”嵌入抗战史研究，就是要以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四大趋势”为核心，集中探讨包含“现代化中断”，即日本侵华造成中国的“半边缘化”和加剧中国社会的“衰败化”；包含“防御性现代化”，即国防工业的发展、国族重建的推行等在内的“现代化”之外，探讨更广泛意义的抵御日本侵略的包含“革命”的“现代化”，特别是传统抗日战争研究中比较少涉及的心理层面的现代化，如抗日战争与中国“国民”意识的觉醒、抗日战争与中

华民族“国族”认同的形成等。

丁贤勇(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史学研究包括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学界往往也是以构筑范式、理论为己任。但是史实与范式关系的把握,依然还是必需正确面对的。下面两个隐喻颇能说明两者间的关系。

一是削足适履。史实与范式间就如同足与履的关系,史实是故有的自身,范式、理论、方法则是附着的一种分析工具。在漫长的过去,史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赤足而行”的无履时代中度过的。最早讨论史学理论的西哲是修昔底德,他提到史家与证据、史学与人性的关系等。在中国,司马迁则是把自己对于理论的思考体现在史书之中。到刘勰、刘知几才有了专门的论述,比如《史通》。近代以降,西学东渐,讨论史学理论者日渐增多,如梁启超、李大钊等。史学自从有了理论,就如人类有了履,如虎添翼,人类才开始奔跑在了文明历程的康庄大道之上,到了今天几乎到了无履不步的田地。但是理论、范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研究历史,决非为理论而理论,为范式而范式,取履而舍足。史实与范式是表与里的并列关系,双方是妙然天成还是削足适履,显然只有是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如果是后者,对理论、概念进行生搬硬套,就走进了形式重于内容的狭窄胡同。

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实、史料是史学的必要条件,没有史实就不可能有史学。白寿彝的《史学概论》中说:“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学科。如果说,客观的历史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史料只是历史过程留下的一些残骸或遗迹,那末,史学的任务却是要从历史的遗骸或残迹中去重认那曾经活生生的历史,并以文字为主要手段将它重现出来。”巧妇纵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难为无米之炊,这就是史料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并且,

史实与范式间是一个从起点出发到达目的地的旅程。在漫长的过去,人类的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茹毛饮血吃生果的蒙昧时代。自从认识到了火,离今天不远的人类历史长河边才升起了袅袅炊烟,人类的素质有了空前的提高。这样,史实和范式是一种序列的递进关系,尤其是到了近代,有了理论,史学进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另外,巧不巧也是个问题,有了史料,纵然不是巧妇也能为炊。当然,无史料是万万不能的,巧妇之巧在于没有条件要去创造条件,傅斯年所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有动手动脚,到处去挖掘史料,收罗史实,才具备进行史学研究的条件,竭泽而渔,努力探寻并逐步靠近历史原貌。

当然,史学研究包括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早已是告别了没有理论的时代,理论、方法、范式、概念建构的重要性早已是无可置疑,史学研究无法回避理论的指导,两者如影如随,无法偏废。但是,理论的深度在于平凡之中的深意,理论的创新也在于对平凡史实独具慧眼的提炼,正如严耕望先生所谓“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并且,不同的理论、范式、方法之间,常常会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或许各有新颖和独到之处,但更多的是互补和扬弃,是扬长补短式的传承与发展。

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长久持续和全面内在地影响着这一进程的两股重要力量;1931—1945年的抗战时期则是这种变迁中具有攸关意义的一个阶段,说明这样两股力量在这样一个关键阶段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影响无疑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地方主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阻力和助力。地方主义作为一种表达人们对某一特定地方认同和维系乃至扩大该地方利益

的观念和行为,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但国家产生以后,地方主义逐渐有了政治层面的意义,即是指人们的地方政治认同和维系乃至扩大该地方利益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包括抗战时期,地方主义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变迁来说,往往会显现为某种阻力和起着障碍作用。首先,它凸显了整个社会的“棱柱化”,即由于人们的地方属性使然,整个社会从横向上被分割成具有某种异质性的不同的地域板块,抗拒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其次,争取民族独立、构建民族国家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变迁中的主要内容,地方主义也常常会顽强地抵御民族主义的整合与超越。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对地方的认同和忠诚是国人在近代之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集体认同、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之一,在走向现代社会和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这种认同和忠诚无疑成为一种内在的阻力,打破抑或至少整合这种认同和忠诚就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和民族国家构建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当然,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进程,地方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也不只是负面的阻力,有时也发挥着正面的助力。第一,地方主义在民族主义感召下,对地方社会的变迁不失为是主要的推动力量。第二,尤其是在1931-1945年的抗战时期,某些局部地方的率先觉醒和奋起,尽管这样的行为是违背中央当局意志的,不为中央当局所允许和乐见的,只是地方性的,是地方的意志、地方的行为,而体现为一种地方主义,但是这种地方主义对中国社会变迁尤其是争取民族独立来说,无疑是正面的。

民族主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力量。民族主义一般是指晚近以来产生的人们与本民族认同和忠诚的情感、观念和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运动。对近代中国尤其是抗战时期的社会变迁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决

定性力量,决定着中国社会变迁的路向、内容及其特征,决定了中国社会变迁的非西方化,即不是由内而外、由经济、文化、社会而政治的内在的渐变的路径,而是由外而内,由政治而经济、文化、社会的外在的突变的路径。其一,政治变迁在整个社会变迁中居于优先和主导地位,经济变迁、文化变迁、社会生活变迁在相当程度上服务和支持政治变迁;其二,在经济变迁中,产权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迁也往往优先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变迁;其三,在文化变迁中,意识形态的变迁优先和主导着其他方面的变迁;其四,社会生活变迁带着浓厚的政治化倾向。

民族主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影响,也造成了社会变迁中的某种偏向和后遗症,并形成一定的历史惯性。社会变迁说到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某些阶段不得已的人为转向和超越,需后来调整和弥补。

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复杂而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变迁。相对于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是后来居上,二者形成新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地方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让位与保留,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对地方主义的消解、包容、整合与超越。从总体上看,二者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二者之间的互动使这种影响和作用更加复杂;从历史发展上看,地方主义作为中国社会变迁中内在而坚固的力量,它不时的显现,表明社会某种程度的棱柱化依然存在;民族主义的强大和时时的发烧,使社会变迁的偏向或多或少地得以延续。令人深思。

翁有为(河南大学校特聘教授)现代民族国家思想,早于中日甲午战后的维新派人士实际上就已经涉及,它以保国保种为号召,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和东洋的军事、政治、科技和教育达到这一目的。1901年梁启超正式提出“民族主义”这个源于西方的新名词。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即缘于日本对中国生存产生威胁这一背景。当时的现代民族思想的主张和方法,从理论上没有错,但在实践上却不能行通,关键在于,被中国人称为文明国的西方人和东洋人根本就不想让中国成为一个与他们并驾齐驱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他们都想当中国的主人。当时,无论是康梁,还是袁世凯,或是孙中山,都是这样一种学习外国、精神上依赖外国强国的思想和方法。其结果,现代民族国家没有建成,反而陷入国内纷争日急、国外压迫日逼的境地。

给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带来新希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祸,使中国人认识到我们所要学习的西方文明,并不应是中国的明天。苏维埃俄国领袖列宁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论述和“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类型划分,使中国新知识分子很快受到启示:即中国是被压迫民族,不应当再甘心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奴役。西方国家在中国新知识分子的认知中,不再仅扮演文明国的角色,还是非正义的、富于侵略的邪恶化身。李大钊就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其意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更有民族主义的。因此,在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反对东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思想认识。此后国共合作所进行的国民大革命,就是一种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对内打倒军阀割据的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革命运动。

南京政府建立后,尽管国共分裂,但国民运动时期所具有的对外独立、对内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思想仍为对立的国共两党和政权所秉承。只是,由于两党及其武装所开展的国内战争,暂时掩盖了民族思想的声言。而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两党所具有的民族国家思想的声言逐渐同步,到七七事变时,终于

形成了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的思想。此时,终于汇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民族解放思想的汪洋大海。因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种思想,当时不仅见之于中共毛泽东等人,也可见之国民党蒋介石等人,更可见之于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书籍和“流行”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歌曲生动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所具有的伟大力量。这一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第二,国家统一、发展和富强的强烈愿望。这些思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陆发春(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由“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作学术主题考量,所涉及的学术范畴比较宽,把时间跨度放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时期思考,符合抗日战争这一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既有历史沉淀前因更有历史重大影响的历史内在逻辑,也便于学人由当下世界格局出发拓展学术视野重新审视中日关系近百年的历史教训,甚至可以超越已往对抗战历史意义的思考和一般性阐述。同时,它所积累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这些年来倡导开展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重大历史主题的深入研究。另外,探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于学术表达的一个优势是能动态地呈现抗日战争在各个社会层面社会角落的图景,就此而论,我认为如能集中开展面向中国广大省区地域社会的区域抗战与社会变迁研究似乎更为合理;各省区地方性抗战时期资料的深度挖掘,有利于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此类宏大主题的总体把握,且更具有实证性。

如果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纳入中国现代化进程这样一个宏大学术主题范围之内,个人的理解,作“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较好的学术表达,还是应该“接着讲”,继续一九二零年

代中国学术界胡适、蒋廷黻等人已经开始的中日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的视角,思考中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诸多社会及国家层面变动的内在动力及其外在表现。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既往的生活轨迹和思维方式。以胡适为例,抗日战争使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具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如果说《独立评论》时期胡适多是出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振兴的单项思维,那么当1938年9月他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后,站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同盟国同情和支持,为祖国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辩护时,很快就发现对中国抗战的宣传、解释,不能简单停留在对日本侵华罪行的揭露层面,要发掘两个国家军事冲突背后更深意义的东西。“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并声言要粉碎此项自强的努力”。(《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1937年11月)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正流着血死里求生的在抗战”及其前景呢?(《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1938年12月),胡适根据中日历史的反思和人类文明史的多维观察,发现“我们抗战虽然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存,也是帮助世界其他国家打倒民主自由公道正义的整个仇敌。假使日本不是受我国的牵制,欧洲战情不知已坏到什么地步了。”(《伟大的同情心》1939年11月)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传统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使中国人民有了发展现代民主制度的传统与准备。”(《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1941年3月)中国是一个最早抵抗日本侵略且持久作战的国家,具有空间、数量、历史性关系、内部的重建、外援等五个主要有利因素,中国的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生活方式!”中日冲突的形态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压迫、帝国主义的战争,“太平洋区域问题的关键,和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毫无二致。那便是极权统治下的生活方式,与民主生活方式的对垒。”(《中国抗

战也是要保卫一种生活方式》(1942年3月)胡适是抗战时期较早用世界眼光观察国际战争,由民主平等、思想自由、民族独立等人类普世价值思考日本侵华战争的反人类反文明本质,进而展望战后世界和平的新秩序;胡适还追溯了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冲突的历史轨迹,进而总结出中日两国迈向现代化进程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反应模式理论。世界眼光、国际视野,成为其后胡适政治思想、文化论观的思考维度。

张艳(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副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这一时期,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中国共产党的“五四”观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1927年以前,早期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把五四运动视为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而且把它同以往的民主革命相区别,强调其“世界革命”的背景。这一判断预示着共产党人将开掘出“五四”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但是到苏维埃革命时期,由于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基本上采取了批判和否定态度。他们反复论述的是“五四”由“资产阶级”领导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性质。每年5月,共产党人并不看重对五四运动的纪念,甚至在1932年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中,根本就不提对“五四”的纪念。在苏区的重要报纸《红色中华》和《斗争》上,也未见1篇专门谈论五四运动的文章,与之相反的是,每年从4月到6月,两报都有大量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卅运动的文章。左翼文化人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除了其“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还有继承的价值外,它所追求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已成了资产阶级的“遗毒”。所以,瞿秋白判定,“‘五四’运动是过去的了”。

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左翼文化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则改变了此前对“五四”否定和“抛弃”的立场。在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内各派势力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高涨,共产党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必须缓和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思想流派的紧张对峙局面,所以对“五四”的精神和成就又重新加以肯定。如胡绳就认为,“过去许多人对于‘五四’运动的理解常是歪曲的、片面的,因此对于‘五四’运动理解的再批判更是必需的了”。他与何干之、齐伯岩等人都批评了“五四时代已经过去”的论断,并提出在民族危机面前,必须继承并超越“五四”未完成的启蒙工作。这种继承与超越的思路,使共产党从此开始以“五四”继承者的面貌出现,从而与在此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五四”观的成熟时期。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国内政治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两党的关系问题在民族战争中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摆在共产党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必须对国内的阶级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回答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前提下,共产党如何处理两党间的关系,如何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以及革命的领导权等重大问题。毛泽东为回应党内外各方对革命前途和方向的质询,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等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五四运动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以论证“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心,把它置于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历程中,对其背景、规模、意义、性质、缺点等进行了阐释。经过党内其他理论家(如艾思奇、陈伯达)和文艺、史学工作者(如周扬、平心、华岗)等的进一步论证或引申,共产党人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带有历史决定论色彩的五四认知模式。他

们把五四运动归结为一场具有界标意义的革命运动,对其参与者分别进行了阶级定性,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运动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二者结合的产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当然,他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出发,对五四运动“脱离大众”和“形式主义”的“缺点”也进行了批判。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和史学支撑,它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掘了一个合法性源头。

黄正林(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抗日战争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且引发了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化。就西北社会而言,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和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地处大陆深处的西北社会依然是死水一潭,经济结构仍然是以传统的农牧经济格局为主。但九一八事变之后到抗日战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论是民间人士还是国民政府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西北,先后组织了诸如西北实业考察团、陕西实业考察团、西北建设考察团、西北教育考察团等。通过考察,“西北地区,建立工业中心,以为建国根本之拟议,遂为各方所重视。”“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30—40 年代,国民政府掀起了开发西北的热潮,加之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工厂内迁,使西北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工业方面,西北建立了石油、棉纺、毛纺、化工、面粉、机械、火柴、电力等现代工业,而且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如抗战时期以上海申新纱厂为代表的一些纺织企业内迁到陕西关中地区,据 1943 年统计,关中有棉纺织厂 106 家,总资本达 3437 万元(法币),动力达 3641 马力,分别占全国的 43%、49% 和 51%,关中发展为中国新兴的棉纺织业中心。1938 年,甘肃玉门油矿出

油后,逐渐成为中国石油工业基地,不仅满足了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运输和军事对油料的部分需要,而且带动了西北其他工业的发展。羊毛是西北的特产,由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兰州成为我国的毛纺织工业中心。总之,经过抗战时期的开发和工业建设运动,西北逐渐形成了以石油、纺织为核心的工业体系。

农业方面,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开始引入农业生产。西北各省成立了农业改进所或农业推广处,培育和引进优良品种,如小麦、水稻、棉花等。同时,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开始用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现代金融逐渐取代传统金融,如1942年中、中、交、农四行派员到西北进行调查,着手筹设西北现代金融网。现代金融业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发放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商品农业等贷款,盘活农村金融,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畜牧业生产技术也得到改进,如在西北主要牧区建立牧场,培育优良种畜,采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改良土种牲畜,利用现代畜牧兽医技术防治畜疫等。

交通方面,除了传统的道路交通外,抗战前后西北的现代交通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一是铁路向西北延伸,1934年12月陇海铁路通到西安,1935年勘察西兰铁路并对沿线做了经济调查,1937年3月宝鸡通车,1941年11月咸(阳)同(官)支线通车,陇海铁路的延伸和支线的建设加快了西北与东南沿海的经济交流。二是先后修筑了西(安)兰(州)、甘新(兰州—乌鲁木齐)、甘青(兰州—西宁)、兰宁(兰州—宁夏)、宁包(宁夏—包头)、宁平(宁夏—平凉)等等,这些公路的修建,形成了以兰州、西安为中心的公路运输网,尤其是甘新公路成为抗战时期一条重要的国际运输线。三是西安至兰州、兰州至新疆、兰州至西宁先后通航。铁路、公路和航空建设,使西北开始拥有了立体交通体系。

总之,这些都说明抗战给西北社会带来了诸多现代化的因素,

促进了西北社会经济变迁,加快了西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变迁最为明显的地域,莫过于东北,因为东北沦陷时间最长,日本对东北的统治也最完善。但是,如果评判东北社会的变迁,中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笔者仅就主要分歧谈个人意见。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说:“满洲国在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下,由于日本重工业的进入取得了经济的成长,中国人口显著的流入。”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说“五族协和”。在日伪统治东北期间,尽管喊出“五族共和、民族协和”的口号,实际奉行的却是日本人高高在上的政策。日本明确提出,“以在住民族的协和为理想,但需依存日本人,没有日本人之协力则不能实现共存共荣”。认为“我大和民族应该继续内含优秀的资质和卓越的实力,对外以宽容来指导和诱导他民族,弥补其不足,鞭策其努力,使不服从者服从,完成上天赋予的实现道义世界之使命”。显然,所谓的“五族协和”,不过以维护日本的殖民统治为目的。

其次说东北经济。客观的说,日本统治东北期间,经济确实得到了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却是以掠夺中国的不断加速为前提的。七七事变爆发前后,为了加速东北战争资源基地建设,保证日本国内经济建设和侵略战争的需要。日伪政府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并相继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产业统制法》等,对东北的工矿业实行“国家”统制,严禁东北的民族业者插足。在此前提下,东北的煤炭、钢铁等重工业生产以及铁路建设等的确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但带来的后果是重工业过热,资源过度开发,殖民地经济畸形膨胀、比例严重失调。截止1945年,尽管耕地面积有所扩



大,但单位农作物产量始终徘徊在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因此可以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开发、建设之类,是为了国内和侵略战争的需要,绝不是为了伪满洲国的“繁荣昌盛”以及东北人民的“幸福安定”。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不再“养鸡生蛋”,而是“杀鸡取卵”,肆无忌惮地掠夺东北的资源,造成东北经济资源的极大破坏,比如对东北森林资源的破坏式采伐,对抚顺、阜新、本溪、鞍山以及北满地区矿产资源的过度采掘,对其他有色金属资源的强制性掠夺等。

再次说人口流入。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伪政府采取严格控制关内劳动力流入东北的政策,理由是:1.“维持满洲治安”;2.“抑制满洲汉族势力的增大”;3.“为了日本人的发展保留余地”等。因此,从1932年到1937年间,年平均进入东北的劳动力仅为39.6万人,为“九一八事变”前年平均73.8万人的53.66%。七七事变后,日伪政府开始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加之关东军在东北边境构筑大规模军事工程,出现劳动力紧张的严峻问题。因此,日伪政府开始从关内大量强制募集劳工。从1938年到1941年,年平均进入东北的劳动力达92.8万人,为九一八事变前的125.75%。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由于劳动力的紧缺,日本又将大批战俘劳工(特殊工人)押到东北充当苦役。从1942年到1944年间,年平均进入东北的劳动力为71.3万人,略少于九一八事变前,其中战俘劳工总数为20万人左右。从东北人口流入的上述过程,不难看出,人口流入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日本统治东北和掠夺东北资源的需要,而非人们对于“王道乐土地”的向往。

李淑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教授)在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主题之下,笔者仅就战争对东北农村社会的影响谈谈个人看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实现永久占领中国东北

的野心,在军力一时难以到达的农村,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输出武装移民。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该计划提出自 1937 年起,用 20 年时间向东北移民 100 万户、500 万人。日本推算,20 年后伪满人口将达 5000 万,力求在计划结束时,使日本移民数达到东北预计人口的 1/10。移民占地标准为每户 10 町步(1 町步 = 0.99 公顷),共计划占地 1000 万町步农耕地,此外,还有 500 万町步的放牧、采草地。而东北已耕地和可耕地总共只有 3000 万公顷,这就是说,计划占伪满 1/10 人口的日本农业移民,将占据伪满 1/3 的耕地。

通过百万户移民计划,日本对农民土地进行了大肆劫掠。据统计,至 1941 年 4 月,伪满政府和满拓会社共“整備”移民用地 2000 多万町步,相当于百万户移民计划原定占地总目标的 2 倍,为日本耕地总面积 600 万町步的 3.7 倍,其中近一半,即 46%,尚未支付地价。计划圈占的土地 80% 分布在北满,占地如此安排,固然是考虑北满土地辽阔,地质肥沃,地价低廉,因而所需投资较少等缘故,更多的还是军事和政治原因。北满是抗日联军最活跃的地区,又是对苏的前沿,日本把移民作为对苏战略的潜在兵源和对内维护其殖民统治的辅助力量。

伴随着土地的剥夺与流失,东北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地权日益集中。土地占有具有贫者畸轻,富者畸重的特点,农民两极分化严重,自耕农因受到冲击而基本瓦解,并生成大量无地农户,佃农和雇农成为农村最大的群体,贫困化阶层扩大。这种畸形的阶级结构和土地占有状况也被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调查所证实。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作为重要的战略地区,中国共产党派大批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各级民主政府适应土改、剿匪和支援解放战争的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编写了《东北农村调查》,得

出的结论是,日伪统治时期东北农村最显著的特点是无地农户比例上升。这种殖民地化的阶级结构和土地产权结构是日本殖民政策造成的恶果。

关于东北土地占有状况,解放初期各地的调查显示,东北北部土地集中的情况比中部和南部更为严重,因北部是日本移民侵略的重灾区。据《望奎县志》、《木兰县志》、《双城县志》和《庆安县志》记载,全部农户的80%是无地或不够标准的小土地耕种者,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百公顷以上的大地主,几乎村村都有。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必然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其农业经营规模极端细小,农民生活极端贫困。是日伪的殖民统治加速了东北农村的破产进程,它预示着一场新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同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并不是日本侵略者所宣扬的“王道乐土”与“民族协和”社会,而是殖民统治的深渊。

郭常英(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报刊作为传播媒介,它的变迁能够直接地反映出社会的变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报刊的研究日益兴盛,抗战时期的报刊研究成果也不少,涉及到办报重要人物、沦陷区及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报刊、区域出版业发展等问题,还有救亡背景下的各类出版活动、抗战西迁对报刊发展的影响、报刊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揭露以及国民政府对报刊的查禁等。我注意到,成果中除了对我国的报刊研究外,还有日本对华的文化侵略与在华通信报刊的研究、南京大屠杀真相早期传播时英美等西方记者报道的研究和海外华文报刊对抗日救国的宣传和推动的研究等。也就是说,学界在研究当时国内报刊问题的同时,还关注国际环境下的报刊问题,这确实是重要的研究视角。

近代以来我国报刊发展迅猛,报刊对人们的思想及其社会变迁的影响日渐重大。至抗战时期,报刊已成为新闻舆论的主要载体,也是当时大众传媒最重要的工具。报刊对抗战局面的反映、对各方态度的评述、对抗战形势的走向和中国前途命运的分析,以及由于社会舆论的导向所引发的社会风潮、所激发的社会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压力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都是人们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大量史料和研究证明,报刊作为重要媒体,确定无疑地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建构起了一个容纳社会言论,影响社会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与官方话语相抗衡的公共空间。尽管抗战期间我国报刊的数量和种类、刊载话题的广度和角度、编者与作者的知识层次和结构,还有国内外生存环境等,都远无法与今日相比,但由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引发的社会舆论在广大民众的生活中同样发挥着相当广泛而深入的感召力。由报刊传播的社会焦点内容,经常成为百姓茶余饭后街谈巷议中的重要话题,这种传播自然而然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认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构成社会变迁的推动力。

从近年来学界对抗战史的研究情况看,报刊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许多研究者特别注意在旧报刊中“寻找”历史,以弥补官方档案、个人文集等资料缺欠,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由此我还想到一个问题,抗战期间的国际形势虽然与我国国内形势不同,但却是同样复杂,特别是两大对立阵营的大国之间较量中有勾结,结盟中有背叛,应当一定程度地反映在报刊上并引起某些社会反响。由于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特殊作用,大国关系问题至今都是人们特别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而目前的相关研究见到尚少。当时报刊反映情况如何?造成的结果又如何?带给人们哪些反思?应是当今研究者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王光银(杭州师范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社会保障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序的尺度之一。抗战前,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几乎空白。国民政府经过几年的努力,特别是结合抗日战争这个现实,积极推行现代社会保障措施,使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步建立起一整套的社会保障体系。战时社会保障对稳定社会,争取民心,争取持久抗战的后续力量起到了积极作用。纵观战时国民政府推行社会保障事业过程,有如下特点:

第一、国民党最高领导当局对战时社会保障事业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蒋介石曾多次发表谈话,要求政府从速组织机构,从事战时社会救济、抢救难民。在《政治的道德》一文中指出“为政之要,就在于竭尽能力定出办法和计划来救治人民的困乏与痛苦”。他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就是特别注重于疾病痛苦贫穷的救济,也就是所谓仁政。蒋介石一篇关于儿童福利的文告中指出:“培养儿童之精神基础,改进其体格,涵养其品性,使普遍沐浴合理的陶冶,实为复兴民族之基本工作。”强调了战时对儿童的抢救教养对国家与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国民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领导机构,使社会保障的行政组织有序,防止政出多门,推广不力的弊端。制定和实施了一大批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及相关行政法规,使战时社会保障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渐次展开。

第二、战时社会保障政策,已由消极的单纯救济向积极的生产自救方面发展。谢徵孚指出,国民政府社会保障“其设施与方法,不仅着重与事后救济,尤侧重于事前预防。”国民政府在战时这样一个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不仅开展了一系列社会保障工作,还能及时地把消极的救济型保障同积极的事前预防,扶助受救济人生产自救结合起来,应予充分肯定。可以说战时社会保障的每一个项目都努力朝这个方面努力,并取得一些成就。如赈济委员会战区

内迁妇女辅导院是一个社会救济机构,收容救助那些从战区迁移后方的妇女。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建院两周年时强调:妇女辅导院不仅仅是救济生活,介绍工作,指导升学,而且“务使我国二万万五千余女同胞,能及时动员为国效劳对抗建大业作伟大的贡献。”在社会救济中,广大妇女由战争的受害者成为抵抗外来侵略,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

第三、社会保障的业务和设施均采取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模式。国民政府在业务方面采取由实验研究而示范推广的方法。如社会部拟建立儿童福利中心区制度,先后在北碚成立儿童福利实验区和南京儿童福利实验区,两个实验区经过试验,提出详细实验报告,经社会部认可后,再推行全国。如战时救济院和育幼院业务,先在重庆和南京分别设立实验救济院,各省也先设一所育幼院作为实验研究机构。再根据国内实际情况,推向全国。

国民政府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积极地从事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为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但战时国民政府社会保障工作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偏差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宣传教育不够,广大群众对社会保障认识不足,以至有些重要社会保障项目如社会保险就几乎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资金筹集形式单一,特别是政府投入资金严重不足,有些东西几乎流于形式;在社会保障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中央和地方、社会建设与军事行动配合不够密切诸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效果。

潘国旗(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战争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社会经济的变迁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笔者仅就战时浙江省的财政措施加以概括的评述,以说明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前,浙江的工商业在全国是比较发达的,而1937年12月以后,由于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沦陷,使钱塘江以北地区的工商业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此后,随着沦陷区进一步扩大到浙东、浙西南地区,日本侵略者在所到之处进行了疯狂的搜刮,致使浙江经济残破不堪,给浙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八年抗战,浙江仅存半壁河山,且多属比较贫瘠之区,财政收入上受到极大的损失。而支出方面,因军费的剧增,导致整个开支庞大。浙江省1939年度支出预算总额是4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经临合计为1400余万元,占全部支出的1/3多。

为了解决浙江省的财政困难,黄绍 第二次主浙后,对战时浙江省财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筹措战时的费用,如调整税收机构、整顿财务行政、开辟财税新来源、整顿旧税收、活泼社会金融等。由于采取了以上这些有利于财政的新措施,浙江省财政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1938年上半年省财政仍处于紧缩中,而到了下半年却有了结余。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这一年半中,省库实际收入数为32248758元,而支出数为26682775元,收支相抵存余达5565983元。但浙江省人民的负担也加重不少,且与各方利益发生矛盾。

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所决定的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对于抗战后期的浙江省地方财政影响重大。与当时全国的其他各省一样,抗战后期的浙江省财政已远不如前。自1942年起省一级财政并入国家财政,中央核定各省的预算额,如1945年浙江省仅为45000万元,与1937年浙江预算30232498余元相比,增加不到15倍,而当时物价已上涨2000倍左右。县级财政(即自治财政)也已岌岌可危。

抗战前期的浙江省财政改革措施和方针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自给自足的方针、量出为入的方针、经济统制的方针等。

在当今的财政体制改革中,我们应该从制度上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与合作,将市场运作与政府必要的管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夏卫东(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如何从政治体制上来看待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政治集权、经济集权等问题值得注意。

抗战之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处于较为松散的局面。但抗日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这一点,从战后初期中国的粮价波动上就可见一斑。抗战爆发后,中国的物价即起波动。1937年上半年至1938年间,一般工业品价格,由于沿海或沿江的各大工业城市相继沦陷,供应短缺,渐次上升。但是有意思的是,各地粮价却因连年丰收,反见低落。根据当时主计处所编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以1937年上半年为基准(100),重庆等7个主要城市的粮价指数在1938年全年平均水平却只有95。1940年7月,由于战争的扩大,物资的损失,全国的粮价突趋猛涨,甚至有粮价超过其他许多产品的价格。1941年粮价指数为1168;1942年为2998;1943年为8466;1944年为29456;1945年为124618。面对急剧恶化的粮价问题,国民政府一方面要求国统区各地允许粮食自由流通;另一方面,在中央成立了全国粮食管理局,调控中国的粮价。1941年,又将粮食管理局上升为粮食部,负责国统区的粮食限价政策的执行。同样的,国民党政府对其他的物价也进行了全面管制。虽然这是出于对战争的考量,但其结果却使战前的“平价政策”被彻底改变,进入了“限价政策”阶段,国家的政权控制力量完全深入到了经济领域。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战争,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这主要表现在户政制度的完善上。

抗战以前,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认识到户籍制度对维护其统治



的重要性,但由于户政系统尚未建立,对于户口查记事务,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有警察户口、保甲户口、户口普查以及户籍登记等不同的户口分类及调查方式,且其专管机构不明确,系统紊乱,权责不专。那时,国民党政府每次办理户政,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办理的。出于“剿匪”的需要,“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1932年颁行了“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为了办理“地方自治”,1935年的国民党“五大”通过了“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之工作案”,其中规定:由中央党部成立“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为全国地方自治设计考查机关,委员会内特设户口委员会,负责清查户口的指导。1936年,因为筹办“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需要各地人口数,国民党内政部通电各省、市政府,要求汇报所属各县市最近编查保甲户口实数。1938年6月,国民党军政部为了推行兵役制度,规定“迅速确定调查户口,限期举办户籍”。户政工作的政出多门,也各自为政,其混乱程度及真实性可想而知。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国民党内政部1941年举办了户籍干部人员训练班,调集各省市办理户政人员集中训练。同年11月,内政部增设户政司,为办理全国户政之最高机构,“以为中国近代户政史开一新纪元”。国民政府还自1942年开始,对各级人口的管理机构进行调整。1944年,内政部统一了各种纷繁的户政法规,容纳于新的《户籍法(草案)》之中。从这一点看,国民党政府践行了所谓的“抗战建国”的理论。但是,这不过建立了国民党一党集权的政治体制而已。

(责任编辑:李仲明)